



人

文

中

国

书

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周昌龙 著

新思潮 与 传统

——五四思想史论集



人

文

中

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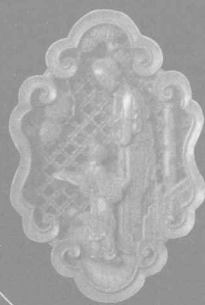
书

系

新思潮与传统

——五四思想史论集

◎周昌龙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周昌龙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 - 80647 - 715 - 2

I. 新... II. 周... III. ①思想史—中国—近代—文集
②思想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238 号

书 名: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

作 者:周昌龙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0.5

印 数:1 - 2000

字 数:24 万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90 元

ISBN 7 - 80647 - 715 - 2/I·456

·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 - 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周策纵序

我以前在美国陌地生市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和同事，现在是台湾文藻外语学院全校讲座教授——周昌龙教授，把他原在台北出版的《新思潮与传统》一书寄来，打算在中国大陆重版，要我写一篇序。我读了他的原书，觉得他论证详实，值得让国内知识界一读，并把我的一些读后感和联想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本书共有十章，每章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第一章讨论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可说是一个基本又重要的问题。昌龙提到鲁迅对尼采“超人哲学”的颂扬，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从情操出发的个人主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是比较重要的对五四新思潮的解释，希望读者仔细阅读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耿云志教授编有《胡适研究丛刊》，其中有不少好的论文；还有耿编的多卷本胡适的书信、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的许多著作，都值得参考；昌龙后来又有《超越西潮：胡适与中国传统》一书，对胡适思想的渊源有更多说明。

第三章讨论的是“戴东原哲学与胡适的知识主义”。胡适对戴震思想素有偏好，昌龙能探索其渊源，说得很好。由于我和胡适之先生相识，并且和他的好些学生如顾颉刚、俞平伯先生等都有许多往来，这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兴趣，连注解我都一条条读完了。例如本章注说：胡适曾在 1915 年 5 月 28 日的《留学日

记》里说过他从此要“专治哲学”；后来在《我的歧路》里又说过“哲学是我的职业”。昌龙发现胡适晚年则改口说：“有时我自称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哲学家。”好像胡适有前后不一之处。其实我想“专治哲学”和以哲学为“职业”，应该都是指“研究”哲学和哲学史。一个研究哲学的人不见得就是哲学家，原无矛盾之处，也不是“改口”。当然，在这一点上昌龙只是指出一些资料记录的事实，不能算做他认定胡适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

昌龙在这章里指出胡适既然肯定宋儒的科学性，又说理学家所追求的“绝对的智慧”是“科学的反面”。我以为昌龙能指出胡适借戴震哲学建立自己思想体系之处，是昌龙最好的贡献。不过他认为胡适用工具和方法来自圆其说是罔顾科学史事实的反因为果的诡辩，却可能会引起误会。胡适所批评的宋儒“没有工具，没有方法（实践），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应该是就科学“发现”说的，试问如果没有较好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怎能发现竹子的纹理、组成分子和更多的星子呢？昌龙所举的好些例子，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牛顿定律的证实，都是在有了更好的工具后才可以成立，早在胡适提取实验主义和介绍杜威的“思想五步法”时就说过了的。胡适当然知道，那是他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诀时就指出过了。耿云志教授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载我的《论“胡适研究”与“研究胡适”：一点别识》，那篇文章对胡适介绍杜威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过程，都应有些帮助了解的用处。

昌龙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十一期（1996年3月）上面发表有《随意写新诗 白首下书帷——周策纵先生治学的三大领域》。他所说的“三大领域”是“五四运动”、“古史研究与经史考据”和“《红楼梦》

与文学研究”。昌龙这篇文章，写得很扎实，也对胡适先生和我有不少辩护。我当然对他很感谢。我认为这是介绍我著作的最切实而深刻的一篇。

这之后有些文章是昌龙当时没有看到的，如我的《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如我的短文《红楼梦与紫鹃名称出处考》（载《明报月刊》2003年4月号），与昌龙在香港所见的初稿已有修正和补充，如已指出在《红楼梦案》中把唐人蔡京诗句的“千年冤魂化为禽”中之“禽”字笔误为“尘”之类。又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创刊号（1995年4月出版）上的长文《〈易经〉里的针灸医术记录》，共五十一页；还有我的《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一书；在香港岭南大学出版的《岭南学报》新第一期（1999年）发表的《扶桑为榕树综考》长文（共六十四页），和次年同刊新第二期发表的《补论》（五十六页），以及尚未发表的《三论》。还有我的论文《说〈论语〉“史亡阙文”与“有马者借入乘之”》（二十八页），昌龙可能没有注意，那是刊在《汉学研究》四卷一期（1986年6月）；龙宇纯教授在《中国文哲研究通讯》三卷四期（1993年12月）曾有一文评介，颇主旧说，我曾想为文答复，牵延未果。还有，我在退休前曾有三篇论文，都载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中国文哲研究集刊》，计有《〈庄子·养生主〉篇本义复原》（1992年3月号）；《〈易经〉“修辞立其诚”辨》（1993年3月号）及《诗歌·党争·歌妓：周邦彦〈兰陵王〉词考释》（1994年3月号）。昌龙也许有兴趣，顺便在此一提。

此外，昌龙这书的第五章介绍鲁迅的思想，都很切实公平。另有四章评论周作人和吴虞，也写得特别好，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还有，我和顾颉刚先生和钱穆先生的一点关系，也应该在此

说明一下。大约在我 1942 年暑假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十期毕业的一年半以前,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先生教过我的中国史,他只教了两个月就辞职了,介绍青年党一位年轻的陶元珍(字贡南)教授来接替。陶先生是个纯粹学者,记性特别好,我们学生都很尊敬他。那时我和同学创办了一个《花滩溪》壁报,因一篇社论得罪了学校,训导长张道藩先生一定要我们自动停刊或改个名称,另起炉灶。我对此颇有反感,觉得学校不该干涉学生的言论自由,打算离开政校。陶先生很同情我们。他说我虽本科尚未毕业,成绩已可算一个研究生了。那时他认识,而且最敬重的两个历史学家,一个是在成都齐鲁大学的顾颉刚先生,一个是在西南联合大学的钱穆先生。陶先生就写信给他们,介绍我去做他们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钱先生回信说:他已回到苏州家中,正准备到成都去,无法接受新的研究生和助理。顾先生也回信说,他正准备到重庆中央大学来,行色匆匆,无法安排。不过顾先生在以后几年里都和我有许多往来。我在 1948 年到美国之前,他还到过我南京家多次。我在侍从室工作时,他给蒋介石的书和信,往往由我转呈。他鼓励我到美国留学,写了好些条幅给我,可惜在 50 年代土改时都给毁了。我只带了一幅小横披出来,后来影印在我替台北金山南路二段 222 号何创时书法艺术展览馆编的《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1995 年 7 月出版)中。那幅横是他写的《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七六则。现在不妨抄录全文在这里,用来结束这篇序文:

支公(支遁,字道林)好鹤,住剡东岬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铄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

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

成，置使飞去。

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语，以壮其行。

三十七年三月，顾颉刚书于白门。

我把这件横披带到美国，固然因为轻便易带；其实更重要的，还由于顾先生所引《世说》这段话，如“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与下面的“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正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有一部分符合。他这幅字，因我恰好要辞掉侍从室的职务，到美国留学，从此走上学术和教研工作，对我鼓舞极大。在我的生命史上，有着转换的作用。因此我把它带到美国，也不是偶然的。

——2003年4月12日，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自序

《新思潮与传统》在台湾出版之后，不停有国内学术界朋友表示关心。犹忆出版之初，我赶到北京开会之便，带了一批要捐给几个重要的图书馆，结果都被北大、清华的朋友中途拦截了，理由是：远亲不如近邻，捐到图书馆不如就近捐给他们。之后，我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大江南北众多英雄的需要。但去年，台湾的出版社告诉我，库存即将售罄，请节制豪举，克己复礼。刚好北大的欧阳哲生兄要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一套丛书，承他厚爱，要将这本东西也收录，我赶忙答应，以后不必再负担这些“乐捐”了。

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将“五四”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论析。与一般视“五四”为一个“运动”者不同，重点不在讨论“五四”作为一个青年运动或文化运动的意义，而在探寻思想传承的渊源及其发展轨迹。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20世纪60年代主导一时“西方刺激——中国回应”模式理论，在80年代文化主体理论的回击下，一度土崩瓦解。最近，国内西化派人士又因种种用心良苦的动机，刻意宣扬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西学的重要性，认为明清以来思想价值和知识体系的转移都受其重大影响，似乎又有回到西方刺激论的趋势。用思想史的眼光来看“五四”，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历史阶段，胡适所谓“全心全意现代化”，堪为代表。但另一

方面,我们从严复、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当时文化界主要人物身上,又都发现重要的传统思想或文化价值传承线索。而这些都是李文森(J. Levenson)臆测的所谓“情感上的留恋”,而是经充分辩证思考后所呈现的结果。情况,显然远比我们从历史表面观察到的要来得复杂。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固然是完全暴露在西力冲击下,向西方取经,变成历史的新课题。然而,知识界代表人物在将目光射向西方理念的同时,心灵所注意的却必然还是自己原来所最关怀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从传统资源中酿制问题意识,再借用西方理念和方法解决。由于意识关怀的不同,所借用的西方理念就不必然是原貌式完整的,而常常是经过了中国式的选择、改造。从被视为守旧派的严复到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情况莫不如此。基于现代与传统之间有这样一种共构性的关系,在分析西力冲击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在西力冲击这个因素之外,近代传统也有本身存在与演变的原动力。

这本书主要在寻找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交接的环扣。这个环扣不可能是西方原装进口,也不会是原貌不变的土产,否则它不可能产生环扣功能。说全盘西化,说回归国粹,都只能是喊喊口号。真正投入历史机轴动作时,一定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与现代文化普遍价值起化合作用的局面;这在一个时代是如此,在一位思想严密而周延的知识分子身上——不管是学者还是作家——情况何尝不是如此。

严复宣扬穆勒(John S. Mill)式自由主义,却在自由主义加入了《大学》的絜矩之道,在个人主义混入了宋明理学传统的道德英雄——特立独操、豪杰之士,使其思想起了一层让西方和东方学者都同样看不透彻的迷雾。

胡适被当代新儒家视为传统文化的叛徒,恨不能灭此朝食。

事实是，胡适对中国文化另有继承，所继承的是他认为从朱熹到戴震的知识主义传统。胡适早在1923年就写成《戴东原的哲学》，自觉地继承并发扬“科学时代的中国哲学”。他中年后认为，中国文化中本就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独立求知和怀疑主义精神，对近代科学因此并不陌生。他这种思路，与章太炎借《诂书》破坏孔孟“道统”而企图另建一孔荀“学统”与荀韩“法统”的用心，其实有些相似，都是用考据建构的手段，要人认识一个理性化、实效化、大中国化（相对于日益狭隘化的儒家而言）的中国文化。

鲁迅用他的创作表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刻与焦虑的心灵，更用自己的生命价值体现现代中国人在非人环境里对人格哲学的深思——无论是出之于呐喊或彷徨。鲁迅要医民族的灵魂，药当然不能是义和团式的人血馒头，却也不见得能乞灵于西医，否则鲁迅不会西医只学一年就空虚绝望，更何况，他的侄女——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就死在他们熟悉的西医手上。作为当时最深刻的心灵之一，鲁迅绝对无法在新与旧中作出革命式的断然抉择；而鲁迅之所以有鲁迅式的深刻，原因也就在这里。

像陶渊明用诗表现透邃的人生境界一样，周作人用其朴素而醇厚的小品散文表现。知堂散文的奥妙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文字背后那通达莹澈的智慧和俯拾皆是的生活趣味。通达有很多种，有孔子式的通达，有魏晋式的通达；趣味的种类就更多了。周作人自己诠释通达和趣味时，用的却是一个让不了解的人听了会瞠目结舌的概念——礼。周氏认为，合乎礼即合乎中庸，即是灵肉合一的希腊文化，即是明治日本的调融文化，也即是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其美感意识中的传统与现代的贯通性，尤的然可寻。

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就如上述,都集中在探讨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之间所存在的贯通性。这贯通性不是指“古代要吃饭现代也要吃饭”这类无意义的呓语,而是指一些在思想主要架构及核心价值上具有显著意义的网维,如严复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豪杰之士,胡适意念中科学时代的戴东原哲学,鲁迅对民族灵魂既决绝又缠绵的“影的告别”,周作人对民族生活美感兼具传统与现代意识的调融诠释等。这些现象在五四时期思想史上是如此真实而普遍的存在,我恳切希望,学界同人在坚持西化论或民族主义批判之前,先平心静气研究一下事实,消除一些“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自由主义传统”这类封闭式的主观判断,减少学术界的内耗。当然,如果有人在资料文献或见解诠释上,发现我所陈述的这些事实并不存在或被我误解,我会虚心接受意见并乐于修正。在此也恳切希望学界能不吝提出这一类的建设性批评。

这本书在撰写和改写期间,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台湾“国科会”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奖励支持,我所服务的暨南国际大学也颁予学术杰出研究奖金;改写出版大陆版时,“中华开发基金”又给予奖励。我对这些肯定和支持深表谢意。业师周策纵先生以八十高龄,仍读完全书并给予宝贵意见,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直接促成此书出版,上海社科院承载教授本亦有意出版此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张国功先生在编辑实务上费尽心力,在此我也献上最诚挚的感谢。张寿安教授和小女之铭跟我是命运共同体,我的工作热情都源自这两位女性,这就不不是“谢”字所能表达的了。

目 录

周策纵序 /1

自序/1

第一章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1

一、前言/1

二、鲁迅与精神界的战士/5

三、周作人与生活之艺术/11

四、胡适与易卜生主义/17

五、结论/25

第二章 严复自由观的三层意义/27

一、前言/27

二、群己权界/28

三、自由与大学“絜矩之道”/32

四、小己自由与国群自由/40

五、结论/47

第三章 戴东原哲学与胡适的知识主义/50

- 一、前言/50
- 二、胡适对宋儒理学的科学化解释/52
- 三、胡适所述戴东原哲学的源流/62
- 四、戴东原哲学中的重智倾向/67
- 五、知识主义道德观的建立/74
- 六、戴东原哲学的难题/81
- 七、戴东原哲学的后继/90
- 八、结论/97

第四章 吴虞与中国近代的反儒运动/101

- 一、前言/101
- 二、生平与学术背景/102
- 三、反孔非儒之理论/114
- 四、吴虞反儒理论的检讨/127

第五章 鲁迅的传统与反传统思想/138

- 一、前言/138
- 二、“呐喊”与“彷徨”/138
- 三、传统和反传统：紧张的来源/146
- 四、孝道和家庭观念/151
- 五、对乡土传统的依恋/163
- 六、传统之破坏与复兴/177

第六章 传统礼治秩序与“五四”反礼教思潮

——以周作人为例之研究/188

- 一、前言/188
- 二、周作人反礼教思想的重要性/190
- 三、礼与礼教/194
- 四、纲常革命/199
- 五、《新青年》的反礼教/206
- 六、人的生活/211

第七章 周作人与《新青年》/222

- 一、《新青年》与反礼教/222
- 二、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226
- 三、周作人与北京大学/232
- 四、与《新青年》的合作/237
- 五、礼与礼教/241

第八章 中国近代新村运动及其与日本的关系/246

- 一、前言/246
- 二、中国新村运动的发生及其性质/247
- 三、周作人早期的政治态度/251
- 四、日本的新村/254
- 五、周作人对新村运动的理念与传播/259
- 六、新村的实验/265
- 七、对新村运动的批评/276
- 八、结论：失落的乌托邦/280

第九章 从“五四”反礼教思潮看郁达夫作品中的伦理认同问题/285

- 一、伦理之我与自然之我/285
- 二、面对情欲/290

◆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

三、从欲的解剖到情的超越/297

四、结论/304

第十章 从《沉沦》到《毁灭》

——郁达夫的情性之旅/306

附 录 周昌龙著述要目/316

第一章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

一、前言

个人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中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许多所谓“中西文化”或“新旧文化”上的激烈冲突,都肇源于此。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所说的个人主义,主要源自西方 individualism 的观念,而非来自中国本身的个人道德传统。^①而且,西方个人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即被知识分子用作思想革命的主要武器,大力攻击中国的道德、礼法和人际关系等,造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严重断裂。^②

检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观点,个人主义的确是他们努力要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新理念,然

① W. m. Theodore deBary,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in de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45 ~ 248.

② 这种分析观点,在中外文化论著中都相当普遍,外国学者著作如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第四章谈易卜生主义部分。中文著作如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北京:三联书店,1988),特别是其第一章和第三章。